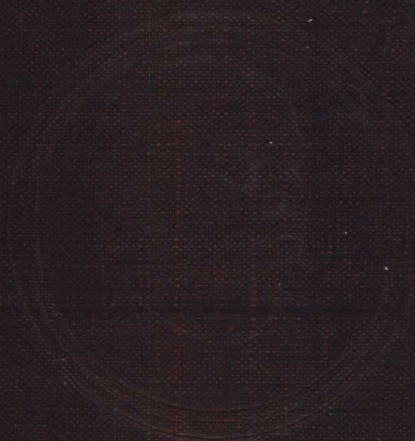


列宁全集



列 宁 全 集

第 三 十 七 卷

1893- 1922 年家书集

列 宁 全 集

第三十七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4 $\frac{3}{4}$ ·插页15·字数593,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60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1·440 定价(四)2.85元

“列宁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译出的。“列宁全集”俄文版是根据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的，其第四版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41年开始出版的。

第三十七卷說明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七卷包括列宁在 1893—1922 年間給親屬的私人書信、電報和便箋。其中有列寧給他母親瑪麗亞·亞歷山大羅夫娜·烏里楊諾娃的信，有給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烏里楊諾娃、妹妹瑪麗亞·伊里尼奇娜·烏里楊諾娃和弟弟德米特利·伊里奇·烏里楊諾夫的信，有給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和姐夫馬·季·叶利札羅夫的信。全卷共收入 274 封信。

收入本卷的大部分書信曾經在 1924、1929 和 1930 年的“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上，在“列寧文集”第 3 卷、第 24 卷、第 25 卷、第 85 卷中，以及在由安·伊·烏里楊諾娃-叶利札羅娃和瑪·伊·烏里楊諾娃編輯的 1930、1931 和 1934 年版的“列寧家書集”中刊載過。

本卷卷首刊載的瑪·伊·烏里楊諾娃給 1930 年版家書集所作的序言和安·伊·烏里楊諾娃-叶利札羅娃給 1931 年和 1934 年版家書集所作的序言（文章）“關於弗·伊里奇的家書”，對列寧家書的內容和意義作了詳盡的闡述。

列寧在一至一個半星期內至少要給母親和其他親屬寫一封信。本卷刊載的列寧的書信，時間相隔較長，這說明列寧寫給家人的信有很大一部分沒有保存下來。這是因為這些信幾乎全部是在革命前寫的，當時列寧的親屬時常遭到搜查和逮捕。列寧的大部分家書曾落到憲兵手里，留有憲兵檢查過的痕迹，例如密探在引起

他們注意的地方用鉛筆划上了紅綫，等等。部分在搜查时被搜走的信件，沒有找回来，有些信是革命后在宪兵局的案卷中發現的，有的信已經残缺不全。許多信在1914—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遺失了，因为当时国外的信件检查得特別严格。

90年代末和1908—1909年所写的書信，保存得最完全，当时列宁正在准备出版“經濟評論集”、“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和“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这些書信的内容很多是請求寄書刊，委托出版書籍和校对校样。

列宁的家書几乎全是按手稿刊印的，只有少数是按警察司案卷里的抄本刊印的，保存下来的是什麼样子(全文或是片段)，就按什麼样子刊印。

本卷中有11封列宁的信是第一次发表(在本卷目录中注有•这个符号)。其中一封是列宁在1912年7月1日写給瑪·亚·烏里楊諾娃的，談到他从巴黎迁居到克拉柯夫。所以需要迁居，是因为这样可以更接近工人运动的中心——彼得堡，改进同“真理报”、同第四届国家杜馬布尔什維克党团的联系，对党組織的活动进行日常的領導。有一封是1919年7月15日寄給“紅星号”巡迴宣传輪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宁告訴她东部战綫攻下叶加特林堡(斯維尔德洛夫斯克)和南方战事变化的情况。

在本卷第一次发表的信件中，还有1919—1922年列宁給瑪·伊·烏里楊諾娃和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的一些很短的便箋。

本卷把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給瑪·亚·烏里楊諾娃、安·伊·烏里楊諾娃和瑪·伊·烏里楊諾娃的54封信編入附录中。这些信談到列宁在流放地和侨居国外时的生活情况，并对列宁書信中的若干事实作了說明。其中有8封是第一次发表的。娜·

康·克魯普斯卡婭同列宁合写的信則編在本卷的正文里。

本卷書信是按年代編排的；寄自俄国的信件，日期用旧历，寄自国外的則用新历。凡是列宁署有日期的信，日期的形式都保持手稿的原状。手稿里沒有署日期的，編者則在信末注上。同时还注明寄往何处，寄給誰，发信人地址，以及此信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发表。

本卷除了注释外还有人名索引和列宁在書信中提到的書刊的索引。

本卷的插图有：亲屬的照片和列宁住过的几处地方的照片。此外，还有列宁的两封信的照片。



弗·伊·列宁
1897 年

1930 年版“列宁家書集”序言

本書所收的書信，主要是弗·伊·列宁写給母亲瑪麗亞·亚历山大罗夫娜和妹妹瑪麗亞·伊里尼奇娜的^①，包括的时期是从 1894 年至 1917 年^②，即从弗·伊·进行革命活动的最初几年起，至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止。这个将近 25 年的时期是我們党出現、形成的时期；而在这光荣的 25 年当中，弗·伊·一直是这个党的領袖，他領導着党，培育着党。他整个一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度过的，他个人的一切也是同这个斗争、同为无产阶级事业所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

虽然現在出版了“列宁全集”，发表了相当多的論述列宁主义

① 不过从內容看，这些信通常都是“为了不重复起見”写給我們全家的，至少是写給当时住在一起的一家人的。

② 这里不包括弗·伊·在流放期間的家書（見“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9 年第 2—3、4、5、6 和 8 期）和 1896 年的家書。1896 年，弗·伊·被監禁在彼得堡的拘留所（从旧历 1895 年 12 月 9 日至 1897 年 1 月 29 日），經常同母亲和姐妹們見面，同他們的私人通信很少〔見安·伊·叶利札罗娃—烏里楊諾娃“弗·伊·在獄中”一文（“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4 年第 3 期）和附在該文后面的 1896 年弗·伊·的两封信〕。从 1905 年 11 月至 1907 年 12 月，弗·伊·住在列宁格勒或芬兰，經常同家人見面，差不多沒給他們写过信。此外，还有許多給安娜·伊里尼奇娜和瑪麗亞·亚历山大罗夫娜的信，特别是当瑪麗亞·伊里尼奇娜住在国外的那几个时期，这些信将另行发表。（瑪·伊·烏里楊諾娃所提到的列宁的書信已編入本卷。——編者注）

的著作（包括科学研究著作和通俗著作），但是关于列宁的鲜明的多方面的个性，至今还描写得很不够，或者说几乎完全没有描写出来。

向讀者提供的这些書信 部分地 弥补了这个缺陷。从这些信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伊·的生活方式、他的习惯和爱好、他对人的态度等等。我們所以特別指出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因为这些信件远不是他在上述时期所写的全部家書。由于家庭經常迁来迁去，同时我們家里的人經常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遭到搜查和逮捕，他的許多書信有些是落到警察手里沒有退还^①，有些就丢失了。在邮寄过程中書信丢失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因此，往往同一个問題連續在几封信中重复提到。此外，这些信件还带有沙皇专制时期警察迫害的烙印。不錯，当时我們凡是通信談工作（报告革命事件、党的生活等等），都是用秘密方法，用化学葯水写信（通常是写在書籍和杂志里），把信寄到外人的“清白的”通訊处去^②。但是个人的一切同革命工作联系得是这样密切，所以私人的合法信件无疑也会受到警察迫害这一因素的严重影响，使我們在写信时不得不大打折扣。弗·伊·往沃洛果达給妹妹瑪丽亚·伊里尼奇娜（当时她流放在那里）去信时就會这样写过：“在我們（特別是你和我）所处的情况下，随意写信已經很困难。”

① 例如，我們在中央档案館发现了弗·伊·的 6 封信的摘录，这些摘录附在莫斯科宪兵局案卷的后面，作为“物証”。我們已把这些摘录編入附录。（見本卷第 530—531 頁。——編者注）

② 当时在俄国保存这些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在国外留下副本的一部分信件保全了下来。

不仅同瑪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是这样，同我們全家人写信也都是这样；因为他們同弗·伊·不仅是亲屬关系，而且观点相同，信仰相同。他們大家（包括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馬·季·叶利札罗夫在內）当时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屬於党的革命派，他們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时刻关心党的生活，与党同甘苦，共患难。就連我們的母亲，虽然她生于1885年，到90年代末期我們家里的人遭到特別頻繁的搜查和逮捕的时候已經是60多岁的人，也十分同情我們的革命活动。

当时革命者的全部合法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所以，在談到我們所关心的問題，回信說某封秘密信件已經收到以及詢問熟人的情况等等的时候，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暗語、暗号之类的东西。

讀者将会看到，在弗·伊·直接寄給母亲、姐妹或弟弟的信中几乎没有提到什么人的姓名，因为在信中如果提到別人的姓名，就会給別人招来麻煩。当然，我們是絲毫不願意給任何人带来一点点麻煩的。如果在弗·伊·的信中仍然能看到一些同志和熟人的名字甚至姓氏，那只是因为反正警察局已通过种种情况（同案流放过，同校学习过等等）知道我們和他們認識，或者因为純粹是事务来往（这时写了出版人、書商等等的姓氏）。为了避免在信中提到具有一定合法身分的熟人的姓名，所以弗·伊·要想談到他們，問候他們，总是用綽号，或者用一件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作个暗示。例如，弗·伊·把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称为“历史学家”（因为他有一些历史問題的著作）；当时弗·伊·通过安·伊·和瑪·伊·同他常有信件来往^①。

① 可惜这些通信保存下来的只有1909年12月16日的一封信。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第113—119頁。（列宁同伊·伊·斯克沃尔佐

弗·伊·在問候和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同時流放在沃洛果達的瓦·瓦·沃羅夫斯基時寫道：“向波蘭朋友們問好，並希望他們竭力給以幫助。”“中國旅行家”是指阿·巴·斯克略連柯，他當時在滿洲的鐵路上工作；“去年和我們一道划船的先生”，是指維·亞·列維茨基；等等。

在提到郵寄的秘密報刊、秘密通訊稿和寫有化學葯水信件的書籍時，也要用隱喻。

1900年12月底，本文作者曾托出國的格·勃·克拉辛把“社會革命黨宣言”轉寄弗·伊·。為了不被發現起見，就把宣言夾在一個照片簿里。這個郵件使弗·伊·非常高興，他在1901年1月16日的信中寫道：“多謝……給我寄書，尤其是托表兄從維也納轉寄來非常美麗和有趣的照片簿；我希望能經常收到這樣的禮物。”

“火星報”及其他秘密出版物寄往俄國的時候，有時是裝在寫着“清白的”、合法的通訊處的封套里。我們還利用這些通訊處作為自己接收書刊的地方。所以，在合法的信件里有時就通知某個郵件已經寄出，以便我們能及時向收件人查問。下面這一段弗·伊·的話（1900年12月14日的信）顯然就包含着這樣的意思：“記得在9日給你寄去了一個你喜歡的小玩意兒。”娜·康·在1916年2月8日的信中寫道：“沃洛佳收到你那封長信非常高興。希望以後多少再寫一些。”我們的合法信件從來都寫的不長，而且這封信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寫的，當時我們通信主要用明信片，而且是掛號的明信片（因為許多信都寄丟了），所以上面這一段話顯然

夫·斯切潘諾夫的通信保存下來的有兩封信——1909年12月2日一封，12月16日一封。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419—422頁和第16卷第113—119頁。——編者注）

是指写在書里寄去的秘密信。

1900 年弗·伊·侨居国外之初，还不知道是否能在国外站得住，当时他为了保密起见，就没有把他本人的通信地址告诉我们；所以当他住在瑞士或慕尼黑的时候，我们给他写信都寄到巴黎或布拉格。例如，他在 1901 年 3 月 2 日的信中写来一个新地址的时候附带说：“我已随房东迁居。”弗兰茨·莫德拉切克（我们的信都寄给他）当时的确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弗·伊·却继续住在慕尼黑的老地方。

弗·伊·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办事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一切开支用度尤其自己的用度极为节俭。看来这些品质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弗·伊·的性格在许多方面都象母亲。而我们的母亲按母系说是德国人，这些性格特点在她身上是很突出的。

从 1895 年 10 月 5 日弗·伊·的一封来信^①中，可以看出他用钱是多么节省，在自己的用度上是多么节俭。

“现在，我在圣彼得堡已开始记流水账，看看自己实际上要花多少钱。结果，在 8 月 28 日到 9 月 27 日这一个月里，一共花了 54 卢布 80 戈比，其中还不包括买东西的钱（约 10 卢布）和我可能要办理的一件诉讼案的费用（也是 10 卢布左右）。当然，在这 54 卢布中，有一部分不是每个月都要花的（套鞋、衣服、书籍、账簿等等）；但是，即使除去这部分（16 卢布），我仍然花得太多了：一个月用去了 38 卢布。显然，我过得不够节俭，例如单是乘有轨马车一个月就花了 1 卢布 86 戈比。以后对环境渐渐习惯了，我就会少花些钱。”

^① 这里说的是 1893 年 10 月 5 日的信（见本卷第 1—2 页）。——编者注

果然他就节省起来，特别是当他自己没有收入，不得不接受“救济”（这是他对母亲给他汇去的款项的称呼）的时候。他自己俭省到这种地步，甚至当1893年住在彼得堡的时候连一份“俄罗斯新闻”^①都没有订，而是到公共图书馆去看“两星期以前的”。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找到工作以后，也许会订一份。”

弗·伊·一生都保持着这个特点。不仅是当他在俄国没有收入的时候，也不仅是当他侨居国外找不到出版人出版自己著作（例如他的“土地问题”一书就曾经整整放了10年，直到1917年才问世），有时简直陷于危急境地的时候（1916年9月他给施路普尼柯夫同志的信^②就是一例），而且当他的物质生活完全有了保障，也就是说在1917年革命以后，他的这个特点也表现得非常鲜明。

不过，有一个方面弗·伊·很难节约，那就是在书籍方面。他为了熟悉国内外种种政治、经济和其他情况，需要阅读大量书籍，才能进行写作。

他在1895年8月29日从柏林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最使我吃惊的是，我的经济又‘困住’了：买书等等的‘大头’这样大，鬼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也尽力减少开支，主要的办法就是到图书馆去工作，而且这样还可以使他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得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环境，摆脱人来人往和谈起来就没有个完的环境，因为侨居国外的人大都对异乡不习惯，感到苦闷，所以都喜欢找人谈心。

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的时候，弗·伊·也常利用图书馆来工作。他在彼得堡的时候曾写信告诉母亲，说他很满意自己的新

① “俄罗斯新闻”是当时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中最正派最吸引人的一家报纸。

②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5卷第223页。——编者注

住处，因为这地方“离中心区不远（例如，到圖書館只要走15分鐘）”。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甚至利用在莫斯科逗留了不多几天的机会到魯勉采夫博物院去工作。在克拉斯諾雅尔斯克等待輪船开航前往米努辛斯克县的时候，他也曾利用尤金圖書館进行研究，虽然每天都要跑上5俄里左右。

在流放地是根本談不上圖書館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弗·伊·要我們設法把圖書館的书通过邮局給他寄去。我們做过几次这样的試驗，但是邮寄時間太长（来回要一个月左右），而圖書館借書是有一定期限的。

但是以后弗·伊·有时还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他在1914年2月11日給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信^①中写道：“关于1905—1908年的刑事案件統計資料汇编，請不要买了（用不着买，太貴了），从圖書館（律师公会圖書館或国家杜馬圖書館）給我借一本寄来看一个月好了。”

弗·伊·在国外时也經常利用圖書館。在柏林时，他在皇家圖書館进行了研究。在日内瓦时，他参加了一个非常心爱的“俱乐部”（《Société de lecture》^②），这个“俱乐部”有一个圖書館，要在这个圖書館里进行研究必須報名加入“俱乐部”并交一定的会費（会費当然不多）。在巴黎时，他在国立圖書館进行研究，不过他說这个圖書館的“工作搞得很糟”；在倫敦时，他在大英博物館进行研究；只有在慕尼黑时他才深以“这里沒有圖書館”为憾事。另外就是在克拉柯夫时他很少利用圖書館。他在1914年4月22日給

① 这封信沒有保存下来，信的摘录是我們从警察司的案卷中找到的（見本卷第489頁。——編者注）。

② “讀書协会”。——譯者注

瑪·伊·烏里楊諾娃的信中写道，“这里（在克拉柯夫。——瑪·烏·）……圖書館很糟糕，而且对讀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圖書館我也几乎没有机会去……”当时他要办报（“真理报”），要同来到克拉柯夫的同志們（到克拉柯夫来的同志比到法国或瑞士去的要多得多）打种种交道，要领导国家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工作，要开党代表會議和工作會議等等，这些工作消耗了他很多精力，使他拿不出很多時間来从事科学研究。即使在这个时候，弗·伊·也来信这样說：“我們常常想念日內瓦，在那里工作做得多些，又有方便的圖書館，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

弗·伊·在帝国主义大战初期在加里西亚被捕获释以后又到了瑞士，他来信說：“这里的圖書館很好，在利用圖書方面我很滿意。終日办报的时期結束以后，讀讀書是很愜意的。”后来他又和娜·康·从伯尔尼到苏黎世，目的之一就是“在当地的圖書館进行一些研究”。因为这些圖書館，据他說，“比伯尔尼的圖書館要好得多”（但与此同时，他还同样紧张地进行政治工作，党的工作；不久前发表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上的弗·伊·在这个时期同卡尔宾斯基和拉維奇两同志的通信^①也明显地反映了这个情况）。弗·伊·侨居国外时虽然在閱讀外国書报杂志方面条件很好，可以到圖書館去借閱，但是俄国書籍却总感到非常缺乏。他在1902年4月2日的信中写道：“在这里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德文書，德文書不缺。这里所缺的就是俄文書。”他在1900年4月6日的信中又写道：“很少看到新書。”毫無疑問，弗·伊·在国外由于手边經常缺少所需要的書籍，他的工作是受到不小的影响的。因此他

① 这些通信的一部分已編入“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編者注

在家書中常常要求家里的人給他寄工作所需的各種書籍（統計材料、有關土地問題、哲學問題等的書籍），以及新書、雜誌、小說等等。從這些信中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伊·在某段時間內對哪一類書籍感到興趣，他運用這些書籍進行哪些研究。

在這些書籍中，他特別重視各種統計資料匯編。

弗·伊·非常重視統計，非常重視這些“確凿的事實、無可爭辯的事實”^①，這一點從他的各個著作中，從他為這些著作所寫的草稿、所做的摘錄和計算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他有一篇論述“民族運動的意義和作用，民族運動和國際運動的相互關係”問題的沒有完成和尚未發表的文章“統計學和社會學”（署名：普·皮留喬夫，這是弗·伊·為了便于出版這本書而用的新筆名），也足以說明這一點^②。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一段話：

“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笑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每一個個別的情況都是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發生的。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繫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末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應該設法根據正確的和不容爭辯的事實來建立一個可靠的基礎，來和一切今天被某些國家所恣意濫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論斷比擬。要這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279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278頁。——編者注